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一直有重视劳动教育的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并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同年教育部下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要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对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等作出了系统规划和部署;2021 年 4 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五育并举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22 年，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相应的学段目标。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各级学校也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要求，劳动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劳动教育课程形式化、技术赋能不足及资源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探讨“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路径，对破解当下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推动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模式概述

(一)文化赋能:以区域特色资源的盘活提升劳动教育亲和力

文化赋能即盘活区域特色资源，将地方民族文化、产业特色等资源融入劳动教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小学生对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有较深的了解和深厚情感，将区域特色融入劳动教育，等于将他们所熟知并且热爱的东西融入课堂，更能提高劳动教育的亲和力。“坚持因地制宜”即根据各地区和学校实际，结合当地在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开展劳动教育，这是劳动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盘活区域特色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赋能劳动教育，是对劳动教育基本原则提出的要求的回应，同时也是提升劳动教育亲和力的重要途径。

(二)科技支撑:以 AI 为支撑提高劳动教育吸引力

科技支撑即适应人工智能(AI)发展，将人工智能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和普及，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已是必然趋势。2024 年 1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明确了中小学加强人工智能教育的总体要求和实施路径;2025 年 4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指出统筹推进大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一体化。同年又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 年版)》和《中小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而“体现时代特征”，即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也是劳动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将 AI 技术运用于劳动教育不仅是趋势，更是相关政策的要求。教师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可以使用 AI 辅助教学，如使用 AI 进行

“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韦柳云

教学设计或适配地区劳动场景等，可以使劳动教育更具吸引力。

(三)机制保障:以“四级双线”协同机制增强劳动教育合力

所谓“四级双线”协同机制是指政府统筹、学校实施、家庭参与、社会支持和线上、线下联动的机制。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大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突出的社会性和显著的实践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劳动教育不可能是学校单方面就能完成的，这就突显了构建劳动教育协同机制的重要性。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等相关文件中都对劳动教育协同机制作出相关要求。因此，构建“四级双线”协同机制，对于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增强劳动教育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模式实践意义

“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模式，有利于破解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促进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其育人实效与时代吸引力。

(一)文化赋能:有利于破解劳动教育形式化误区,增强学生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当前劳动教育存在着易陷入“为劳而劳”的形式化误区。如“一些中小学劳动课存在课时被挤占、作业靠摆拍等‘走过场’现象”，“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存在过度依赖技能训练而忽视价值引领的倾向”。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育人功能的教育活动，形式化的“为劳而劳”，显然无法发挥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区域特色文化，如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教育资源、非遗技艺、地方产业等，是中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将这些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关联的文化资源融入劳动课程，通过劳动教育这一载体，把抽象的“劳动精神”转化为具象的文化实践，更能引发学生共鸣，有利于增强学生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从而破解劳动教育“为劳而劳”的形式化误区。

(二)科技支撑:有利于破解劳动教育效能边界问题,培养兼具劳动精神与数字素养的新时代人才

当前，“很多中小学教师认为，劳动课较难设计，不易实施，很多想法在课堂上难以实现，有时感觉时间不够，匆匆忙忙。”这一现象与劳动教育技术赋能不足而导致劳动教育效能存在边界有关。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给劳动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如进行教学设计，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创新性；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丰富劳动教育内容及场景，使一些在课堂上难以实现的想法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得以实现，使劳动教育更加生动形象具有吸引力，从而实现劳动育人目

标。此外，一些地方产业特色为高危劳动，如电气、机械等，通过 AI 模拟实训可以更为安全地开展。可见，人工智能与劳动教育的融合不仅可以创新教学形式，还可以破解劳动教育因技术赋能不足而产生的效能边界问题，同时这一过程也向学生传递着科技发展给教育及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在潜移默化中数字素养的意识已经在头脑中萌芽，对培养兼具劳动精神与数字素养的新时代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三)机制保障:有利于破解劳动教育资源保障不足问题,增强劳动教育育人实效

运行流畅、协同高效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劳动教育资源协同供给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制度支撑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利益冲突阻碍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劳动教育存在家长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社会对劳动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四级双线”机制通过政府资源调配如场地、经费等，企业、社区等提供实训岗位，家庭履行日常劳动督导，线上平台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劳动专区共享资源，形成多维支撑网，有利于破解劳动教育资源保障不足问题，促进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劳动教育育人实效。

三、“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模式实践策略

(一)文化赋能的落地策略:构建“三位一体”资源转化模型

1.建立区域劳动文化资源数据库，绘制“劳动教育地图”

区域特色资源只有被教师掌握，才能走进劳动教育课发挥其育人功能。因此，通过建立劳动教育资源数据库，绘制“劳动教育地图”，可以使教师轻松地掌握这些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并将其与劳动教育融合。如成都市发布的青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数据库，整合了全区 97 个非遗项目资源，涵盖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类别，通过该数据库还可查询到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姓名、所属项目、属地等信息。

2.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课程，构建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体系

中小学校可以结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中和了解并传承本土文化，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如福建武夷山一中积极推进校本课程特色化，其中“茶文化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校本课程，是其“双减”背景下开展劳动教育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3.实行“双导师制”，汇聚校内外师资智慧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有效融合，只靠校内劳动教育师资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实行“双导师

制”，由校内教师主导课程设计，校外如非遗传承人、工匠、产业负责人等负责技能传授，如此便能汇聚各方智慧与资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劳动教育课，使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双导师制”要发挥长效机制离不开相关政策配套的落实。对此，学校可以制定《校外劳动实践指导教师聘用管理办法》，在明确责任义务的同时，保障兼职教师课时津贴。

(二)科技支撑的突破策略:打造“AI+ 劳动教育”融合新范式

1.重视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数字素养

科技支撑首先得教师掌握科技。很多老师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 ChatGPT、DeepSeek 又横空出世。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AI+教育”已是必然趋势。对此，焦虑、无所适从成为部分教师共有的心理状态。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大培训力度，帮助教师认识和了解并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如此才能很好地将人工智能与包括劳动教育在内的各学科融合。

2.落实“AI+劳动教育”，创新劳动教育育人模式

一是智能重构教学场景，实现“虚实结合”。“讲解说明”即“加强劳动知识技能的讲解，让学生认清事理，掌握实践操作的基本原理、程序、规则，正确使用工具的方法和技术。”这是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利用人工智能重构教学场景，可以把教师在“讲解说明”环节的课堂语言可视化，使学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还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本应实践环节才能体悟到的场景提前让学生通过虚拟劳动场景或者 VR 技术体悟。如此，“虚实结合”既活跃了课堂氛围又增强劳动教育吸引力、感染力。

二是教学过程智能化，实现精准管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 AI 分析操作视频、作品数据等，生成技能发展曲线图，及时掌握学生劳动技能的掌握情况，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在教学评价环节，通过 AI 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全方位地获取学生的海量信息，提高信息获取的精准度，更能够充分吸纳学生、家长、校外劳动教育基地社会人士等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主体的意见”，从而实现劳动教育全过程的监测，客观记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实现精准管理。

3.建立劳动教育 AI 资源库,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和动态进化

“在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励中，将劳动教育教学成果纳入评奖范围，对优秀成果予以奖励。”这是对劳动教育激励机制的要求。由此，可以将评选出的优秀教学成果纳入劳动教育 AI 资源库，实现劳动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和动态进化。

(三)机制保障的深化策略:完善“四级双线”运行体系

1.政府统筹:发挥制度供给和资源调度的

作用  
劳动教育资源保障不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层面作用力发挥不足，也就是社会的不支持，想要的资源无法供给，使得劳动教育难以高质量开展。社会层面的支持涉及各方主体，唯有政府统筹才能破局。由此，政府层面可以出台相关制度，明确各方权责，合理配置资源，才能保障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如陕西省安康市出台了《安康市中小学劳动教育促进条例》，对劳动教育各方主体的权责、资源的配置及资金保障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2.学校实施:发挥劳动教育主导作用

学校是劳动教育实施的主体，因此在协同机制中学校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意见》要求，“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要切实承担劳动教育主体责任”。对此，学校要重视劳动教育，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规范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同时根据区域特色开发校本课程，并积极与家长、社区等沟通，推动建立协同机制，形成育人合力。

3.家庭社会协同:发挥监督与支持作用

《意见》要求“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因此，家庭要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不可一味地追求学习成绩而忽视孩子的全面发展。日常生活中注重给予孩子劳动实践的机会，指导帮助孩子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同时积极配合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监督督促孩子完成劳动教育任务，以良好家风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成才。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资源的大力支持。对此，各社会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农场等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满足学校劳动教育的需求，尽己所能，为劳动教育提供相应的资源，助力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4.线上线下联动:教育合力作用发挥的载体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线上线下联动的协同机制提供了可能。线上，教师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跨区域、跨校际、跨时空获取劳动教育相关资源，又可以通过劳动教育智能平台的建设，实现劳动教育全过程智能化管；线下，教师通过线上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两线”之间的联动，把家校社及政府“四方”紧密关联，教育合力作用得以发挥，从而促进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综上，“文化赋能、科技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模式，为破解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困境提供了系统性方案，对推动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劳动育人目标有重要作用。未来需进一步深化路径的适应性研究，推动劳动教育向更高阶形态演进，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育美的育人目标。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资源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沉浸式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5JGB4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数字资本主义下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新异化形态研究

■ 林子安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数字化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重塑着社会结构，数字资本已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数字资本主义凭借先进的数字技术，构建起复杂而高效的运行体系，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消费与社交模式。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在数字时代下数字劳动中劳动者主体性的丧失、消费领域符号操控与欲望再生机制的盛行，以及社交领域人际关系被量化异化等现象，都表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衍生出了新的异化形态。深入研究新异化形态，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也能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异化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劳动异化现象呈现出全新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劳动者对自身创造的数字产品完全丧失支配权；另一方面，整个劳动过程日益受到技术规训与资本逻辑的双重支配。作为传统物质劳动异化的当代延伸，数字劳动异化本质上体现为劳动者在数字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丧失。这种新型异化形态的运行机制体现在平台企业通过智能算法对劳动者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从而精准把握劳动者行为模式与心理特征，进而实现精准营销与利益最大化的差距。其次是在金融化消费模式的渗透，各类消费信贷产品的泛滥使劳动者可以通过透支未来收入来满足当下的欲望需求，也就是“超前消费”，这种即时满足机制表面上赋予了消费者更大的选择自由，实则使劳动者陷入“债务—消费”的闭环之中。当消费行为脱离实际支付能力时，消费者实质上丧失了消费决策的主体性地位，沦为资本循环中的一个被动环节。这两个消费

以外卖行业为例，在平台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骑手作为典型的数字劳动者，其工作过程完全受制于算法系统的支配。平台企业运用机器学习技术不断优化配送算法，将配送时间精确到分钟级别，极端的时间压迫迫使骑手不得不采取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其生命安全。并且，骑手在配送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都被平台无偿占有，成为训练更高效控制模型的素材。这就形成了一个劳动者越是努力完成配送任务，就越是强化算法控制提供更多数据支持悖论式的循环，最终使自身陷入更深的被剥削境地。

二、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消费异化现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其本质已演变为一套精密的符号操控体系与欲望再生机制。消费新型异化模式主要通过两个相互强化的现象表现出来。首先是符号价值的建构过程，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借助智能算法技术，精心塑造出特定的消费符号体系，制造“伪需求”来重塑消费者的欲望结构。平台经济中的意见领袖们运用数字影像技术构建的“理想化生活图景”，本质上是通过数字修饰与场景摆拍制造出的拟像世界，却成为普通消费者竞相模仿的对象。这种符号暴力导致消费者陷入永无止境的“需求再生产”困境，即便获得了心仪的商品，与经过美化的示范样本之间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差距。其次是在金融化消费模式的渗透，各类消费信贷产品的泛滥使劳动者可以通过透支未来收入来满足当下的欲望需求，也就是“超前消费”，这种即时满足机制表面上赋予了消费者更大的选择自由，实则使劳动者陷入“债务—消费”的闭环之中。当消费行为脱离实际支付能力时，消费者实质上丧失了消费决策的主体性地位，沦为资本循环中的一个被动环节。这两个消费

模式的异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特有的消费异化现象，由符号刺激不断制造新的消费欲望以及通过金融工具确保自身欲望能够得到即时满足，最终资本增值的终极目的得以实现。

三、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社交异化

在数字社交蓬勃发展的当下，尽管社交平台有效突破了地理空间的桎梏，为人们搭建起便捷的沟通桥梁并推动人际交往的深化，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交异化现象。以“点赞经济”为代表的表现形式尤为突出，社交平台借助这种机制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可量化交易的数字符号体系。用户为获取更多点赞和反馈，往往需要刻意塑造社交形象，陷入“情感表演”的循环之中。虚拟社群中的身份表演现象亦不容忽视，用户在构建特定人设以融入群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一般视为表演性社交，而表演性却会导致真实情感的逐渐消解。当用户在虚拟世界中寻求归属感时，用户的现实交往能力却会因过度依赖虚拟身份而出现逐渐退化的现象。社交平台的数据化机制将用户行为全面转化为可评估的量化指标，这些数字符号不仅成为衡量社交价值的标准，而且也异化了人际关系的本质属性。在虚拟社群中，用户为获得群体认同而持续进行身份表演，在这个过程中迫使个体隐藏真实的想法与情感，导致虚拟交往的浅层化与真实性缺失。货币作为满足人的利己需要的中介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纽带，它能够把美的变成丑的、把丑的变成美的。以货币作为媒介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必然使人的交往以反人性的情形呈现出来。这种量化化解解构了人际关系的情感内核，将社交互动异化为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深刻反映出数字时代社交异化的本质性转变。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旨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以及乡村社会与生态的全面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有效转化生产力、提升乡村经济，成为关键问题。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代表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农业现代化，同时助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这一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指导，因此，有必要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一、产业向度:新型生产力在乡村经济中的转型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产业振兴尤为重要。我国乡村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亟需转型，而这—转型的核心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智慧农业和数字经济是当前乡村经济转型的两大核心领域，也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体现。

智慧农业利用先进科技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农业高效、精准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快速进步，乡村农业生产进入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物联网技术使得农田环境得以实时监控，并精准调控灌溉和施肥，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值。智能灌溉、精准施肥、无人机植保等技术推动了农业管理从传统经验向科学管理转变，促进了生产效率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智慧农业不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更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转变。

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成为推动乡村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变了乡村产业结构。通过数字平台、大数据和电子商务，农产品可直接对接市场，突破了传统流通渠道的瓶颈。农民通过线上销售农产品，减少了中间环节，直接提高了收入。同时，数字支付和电商平台的普及改变了乡村居民的消费模式，推动了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全面提升。

二、人才向度:人力资源在乡村发展中的再组织功能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培养符合农业需求的人才——“新农人”。新农人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推动乡村创新与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信息技术和智慧农业的应用，传统农业劳动者亟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新农人培养的关键在于技术与创新能力的双重提升。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农人不仅需要掌握现代农业技术，还须具备创新思维，灵活运用新技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农业技术培训与职业技能提升，乡村能够培养出一批既具有现代农业管理能力，又能进行科技创新的农民。这不仅提升了乡村生产要素的提升，更是推动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创新相匹配。因此，新农人的培养不仅是技术培训，更是对乡村生产关系转型的推动。

远程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提供了重要手段。通过互联网平台，乡村居民能够接受与城市同等水平的教育，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这种教育形式打破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马克思主义强调教育在提升劳动者阶级素质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远程教育正是这一作用的有效体现。通过远程教育，农民不仅能学习农业技术，还可以接受现代管理与商业技能的培训，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整体素质。

三、生态向度:绿色理念在乡村建设中的功能再造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升，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更是生态的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实现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在这一过程中，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的应用已成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绿色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环境友好型转型。在农业生产中，绿色技术不仅有效减少了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还能够提高土壤肥力，提升农产品的品质，生物肥料、自然农药以及节水灌溉技术等绿色技术，既保护了农业生态环境，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例如，智能灌溉技术通过对水资源的精准管理和调控，不仅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还提升了农田灌溉效率，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推动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

清洁能源作为绿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加速推动乡村的绿色转型。乡村地区广阔的土地资源使得清洁能源的应用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乡村地区不仅能够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还能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清洁能源的应用不仅减少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还促进了绿色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乡村经济的绿色竞争力。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已成为推动乡村绿色振兴的重要途径，为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当代阐释

——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文本考察

■ 丁 萱

1884 年恩格斯在摩尔根、马克思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时至今日,《起源》中关于国家的相关理论对于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仍具有时代价值。

一、追本溯源:《起源》对于国家理论的系统论述

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恩格斯吸收摩尔根、马克思的观点得出“氏族社会”人地位平等、决策环境民主。随着私有制的发展,氏族社会的各种关系逐渐瓦解演变成国家。《起源》中恩格斯用两种生产理论论证“氏族社会”的民主环境有利于集体协作,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私有观念萌芽进一步推动私有制的产生,进而推动国家的产生。

国家的本质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统一。国家的阶级性从定义中体现:“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的存在意味着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一直存在。《起源》中指出,国家产生的三种形式中,“雅典式”国家与“罗马式”国家是为了缓和阶级斗争冲突而产生,而德意志国家则是因为“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国家既是因适应阶级统治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适应社会管理需要而产生。

国家的未来趋向于自身解构与消失。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知,国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推动国家的产生。当生产力发展高度发达时,阶级消亡,国家也会丧失其功能而消失。“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

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随着国家的自身解构与消失,未来的社会将演变为自由个体的联合体。

二、时代价值: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起源》中的国家理论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根据《起源》中阐述的国家相关理论,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发展。这一经典论断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作为社会矛盾调节器与现代化推动者的双重属性得到充分彰显,如构建“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创新以及实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一系列举措推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

《起源》中的国家理论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发展的方法论。对内我国坚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矛盾。既承认国家的阶级属性,又强调通过法治建设、民主协商等制度化手段调节社会关系,完善国家现代化治理。对外我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人民交流互鉴、共赢,携手创造美好未来,共享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化中“和而不同”的多元共生理念与“兼济天下”的天下情怀。

三、现实启示:推动我国现代建设与发展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属性。“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关注民生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首要的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民社会与国家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建设阶级性与社会性统一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继续坚持基层民主建设,为民众提供可靠和可信赖的平台。《起源》中提到,氏族社会群策群力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政府不仅要重视社会治理,同时也要发挥人民群众自我管理意识。基层群众自治的“最后一公里”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群众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守正创新。恩格斯揭示国家本质上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推动。当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必须聚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运用数字经济重构传统产业体系,依托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向未来。国家的未来趋向于自身解构与消失,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性提出并积极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践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机制,“数字丝绸之路”等载体践行美善与共的多边主义,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基本框架的同时,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渐进式解决方案,为未来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积累物质文化条件。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